

# 从齐家文化考古资料看西北 地区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

王吉怀

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证明,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以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到阶级社会,还有一段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既包含有原始社会的一些因素,又孕育着阶级社会的萌芽,实际上,属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探讨父权制的发展,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都可从这一期文化中找到渊源。

黄河上游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是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的重要地区之一,齐家文化就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发现铜石并用的考古遗存。这为我们研究西北地区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本文试图通过已发表的齐家文化考古资料,探讨一下这一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

## 一、墓葬材料

齐家文化的墓葬材料是很丰富的,从墓葬材料中可以看到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和财产分配的不平均现象。促使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由于定居生活的稳固,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得到不断发展,产品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样除了满足氏族成员维护生活的正常消费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剩余,或者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这就会出现剩余归谁所有的问题。众所周知,母系氏族公社发展时期,成员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虽然当时有部落首领和一般成员地位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存在于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分配上的悬殊。社会的进展使妇女地位下降,男子地位上升,又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因而私有制便动摇了公有制所特有的公平分配产品的制度,这种私有制的萌芽既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又引起了对财富的贪欲。母系大家族所以是瓦解氏族公社的基本因素,是因为它是过渡到父系的重要环节。过去曾有人认为,母系氏族公社瓦解后,出现了个体家庭,从而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现在看来,这种过渡是通过母系大家族转变为父系大家族的途径而进行的,个体家庭的出现,是较晚的事情,很可能个体家庭是从父系大家族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后仍然还存在着父系大家族,最终进入到阶级社会。

从母系大家族到父系大家族是和对偶婚相适应的,在开始出现母系大家族的时候,实行的还是传统的外婚制度,当对偶婚出现以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之出现了一夫

一妻制,由男到女家逐渐改变为女到男家,这大概也是从母系大家族过渡到父系大家族的一种形式,也可以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

由于男子地位上升的结果,致使妇女和剩余产品便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现象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表现的是相当突出的。齐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见不到体现母系大家族的迁徙合葬墓和青壮年男女分区埋葬的现象,而新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氏族制度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青海柳湾<sup>①</sup>,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最大的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共墓地。这里不仅墓葬数量多,而且出土遗物丰富,为我国近年来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柳湾墓地共清理齐家文化墓葬366座,与甘肃境内的永靖大何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的齐家文化墓葬有所不同,柳湾的齐家文化墓葬既富有本身的特点,又保留了马厂类型的某些成份,有从马厂类型过渡到齐家文化的明显特征,并有浓厚的地域性。在柳湾的齐家文化墓葬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墓葬规模有大小之分,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也有相当大的悬殊,并且首次发现了齐家文化结构清楚的木构葬具的痕迹。在366座墓葬中,发现20座二人合葬墓,主要指一人葬于棺内,一人葬于棺外;3座双棺合葬墓,主要指两具木棺并排同葬在一个墓坑里;2座二人同棺合葬墓,即二人同埋于一具木棺内,同时也发现了没有任何葬具的土坑墓,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仅举两例:

墓1061,独木棺一具,男性(25—30岁)仰身直肢葬于棺内;女性(30岁)头骨倒置葬于棺外,十五件器物分别放在男性胸部,头部附近和女性左侧。

墓1112,独木棺一具,男性(40—45岁)葬于棺内;女性(成年)身首分离葬于棺外,随葬品只有一件石刀和一件粗陶瓷。

这两座墓的情况说明,同是夫妻合葬,其自身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出现了夫妻与夫妻间贫富分化的现象。随着这种现象而来的是人对人的奴役和家族奴隶制的出现。在距今六千年前后的某些氏族公共墓地,就发现有仰身葬、俯身葬、屈肢葬等不同葬式,这些不同的葬式,标明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在齐家文化的男女合葬墓中,其表现的并不单纯是夫与妻的关系,可能还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一夫多妻、或杀妻(妾)殉葬在齐家文化中已经盛行了,尤其在一座合葬墓中,男性骨架完整,女性骨架散乱,这说明男性是一次葬,女性却是二次葬,这显然是在埋葬男性时把女性从别处迁来与他合葬,反映出男性居于主要地位,而女性居于从属地位。在随葬品的分配方面,男性要比女性优越的多。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48<sup>②</sup>,是一座一男二女合葬墓,坑长2.6、宽1.48、深1.15米,男性中间仰身直肢,左右两侧为女性侧身屈肢。引人注意的是,八十三件石璧和一件玉璜都集中放在男子身上,另外,十件陶器也集中放在男子脚下。

墓66,也是一男二女合葬墓,随葬的十五件石璧,有十三件放在男子身上,在女子身上只有两件。从骨架的姿势看,男子正中仰卧,二女侧身在左右面向男子,下身屈肢,有的两手屈在胸前,活现出侍奉、屈辱的状态,这应是妻妾为丈夫殉葬的明显例证。

这种一男二女合葬墓,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时少数比较富有的家长或氏族酋长过着一夫多妻的婚姻生活,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它透露了齐家文化时期存在过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姻形态,是从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以前的特殊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

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由此可见,墓中的男人应是富人或显贵。另外,墓中的三具骨架保存的非常完整,③看来是一次埋入的,但又不可能都是同时死去,这应是一种杀妻(妾)殉葬的残酷情景,这种现象说明,父系大家族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原始组织形式,是男性奴役女性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④

甘肃秦魏家墓105⑤,是一座男女二人合葬墓,女性的姿势很特别,屈肢面向男子,双臂搭在男子肩上,这种顺从丈夫的姿势,表现了两者既亲密又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应是杀妻殉葬的显例。

妻子殉夫的习俗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例证,如巴厘岛的巴厘人,以前曾存在过同样的习俗,丈夫死后,要把他的妻子活活烧死,这叫做寡妇殉夫,同样标志着男女不平等的地位。

齐家文化中,除夫妻合葬外,还有父子合葬,大何庄墓28、55、63,都是埋葬着一成年男性和一个6—7岁的儿童,葬式与夫妻合葬相同,成人仰身直肢,儿童侧身屈肢。⑥

这种现象,都是与原始社会的瓦解、阶级的产生相一致的,它为我们研究“男尊女卑”和世系按男系计算的历史根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这正是“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⑦

齐家文化时期,既有规模宏大的男女合葬墓,也有单人墓,更为明显的是,利用废弃窖穴埋葬的现象已普遍存在,这种墓坑里的骨架多为散乱,往往没有随葬品。

皇娘娘台墓79,把主人埋在一个废弃的窖穴中,无随葬品。这种反映在墓葬制度上的差别,更加显示了拥有财产的重要意义,对那些规模宏大的合葬墓来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这些墓主人完全不掌握财产,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财产是十分有限的。

齐家文化时期,用以表示地位的高尚,除了用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随葬外,用大量的猪下腭骨随葬,也体现了死者生前拥有的财富和居有高尚的地位。柳湾、皇娘娘台、秦魏家、大何庄等墓地,都出现了用大量猪下腭骨随葬的现象,每座墓最少一件,多者六十八件(秦魏家墓6)。这些墓葬,多为成年男性墓,既是男女二人合葬墓,猪下腭骨也多放置在男性一侧。看来财产的占有者是男子,牲畜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已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坚固的经济力量。

用猪下腭骨随葬的现象,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也有较多的发现,大汶口133座墓葬,约有三分之一的墓里随葬着猪头骨、猪腭骨、猪蹄骨和猪脊椎骨。可见我国的私有制,从猪这种重要的动产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与氏族集体共有制发生着日益尖锐的矛盾。以家畜作为私有财产或贫富象征的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能找到一些实例。

过去佤族中饲养家畜的,多属于富人,凡剥牛或猪较多的称为“珠米”,即有钱人家之意,为了葬事而剥的牛头或猪头,有的也捆绑好立于墓中央的木棍上,⑧以享死者。海南岛

的黎族在解放前有的酋长畜牛到二千头,而论贫富阶级也往往以畜牛多少来定,同时还流行用猪或牛的下腓骨祭奠死人,并随着埋入墓中。<sup>⑨</sup>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把平时吃剩下的猪下腓骨挂在室内的墙上以作为财富的标志。<sup>⑩</sup>这种习俗不但在国内有,甚至在世界各地都可找到许多例子。如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南部地区的马赛族,他们的生活是离不开牛的,他们把牛看成是命根子。除吃牛羊肉饮牛血外,还用牛作交换媒介,并以牛羊作聘礼,杀牛羊祭鬼神,牛羊的多寡成了他们贫富的唯一标志。<sup>⑪</sup>

这些资料表明,达到一定数量的家畜,都属于富人的私有动产,同时也反映了所有者的社会地位。

我们根据所取得的墓葬材料,对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历史、社会形态,能够描绘出一个总体的轮廓:发达的齐家文化,已达到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生产力的进步,是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的物质基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以及交换关系的发展,也为阶级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马克思早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就是说,阶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会在将来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消灭。我国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条件和进程,完全证明了马克思所作的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性。

为什么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之后,会进入阶级社会呢?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sup>⑫</sup>社会分工的出现,表明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我国在仰韶文化之后,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工,原始社会的那种采集生活和渔猎生活已经逐步为农业、牧畜业、手工业所代替。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强化,导致财富起了分化和男女地位的改变,这些变化只能在墓葬方面体现出来。

## 二、铜器的使用

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发展史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使之出现了真正的工业。齐家文化的铜器资料,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比較早的资料,因而也是比较重要的。1957——1959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获得23件铜器,1978年的发掘又获得7件。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和青海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有铜器出土。器形有刀、锥、凿、环、匕、钻头、铜片和铜渣。这些铜器分别经过甘肃省冶金工业局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冶金部有色金属院、北京钢铁学院光谱分析室等单位的化验结果证明,铜刀所含的铜量为99.63——99.83%,铅、锡、锑、镍等元素含量的总和为0.13——0.37%;铜锥所含的铜量为99.87%,铅和锡含量的总和为0.13%;铜片的含铜量为96.96%,锡为0.02%,铅痕迹量。

从齐家文化发现红铜的事实可以断定,我国的冶金工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标志着齐家文化时期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也暗示了我国的铜器文化并不是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突然开始的,而是由红铜时代发展而来的。我国的齐家文化已经进入了红铜时代。虽然铜器的器形还比较小、制作技术比较粗糙,但它必定为青铜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铜器的制造工序要比石器复杂,而且需要有部分人专门从事这项生产,这一新技术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奴隶制的领域。

## 三、卜骨的出现

卜骨出现在齐家文化中,说明当时已经盛行以占卜为形式的迷信习俗。占卜的出现,大大加速了私有制的形成和氏族公社的瓦解,促进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些卜骨大都是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做成,皇娘娘台遗址发现39件,大何庄遗址发现14件。

尽管齐家文化中的卜骨资料比较少,但这种现象告诉人们,我国西北地区占卜的出现是比较早的,这正是阶级压迫的前夜。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齐家文化是继关中仰韶文化(过去曾有人把马家窑文化称作“甘肃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而关中的仰韶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其社会性质大致相同。六十年代初,对中原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那时已有人提出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sup>⑬</sup>但多数意见认为到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齐家文化)才真正进入到父权制时代。多年来,对仰韶文化的探讨与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随着新资料的增多,人们的研究观点也在不断改变。最近,根据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提出“仰韶时代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观点。<sup>⑭</sup>仰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早期到晚期有几千年的历史,社会内部的变化也很平衡,所以考古观点的确立,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如果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确实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那么,关中仰韶文化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由关中仰韶文化发展为齐家文化时期的父权制的发展也必定给私有制的形成和阶级的出现开辟更加广阔的领域。

尽管如此,对齐家文化的分析,也不应割裂问题和孤立的考察,必然把各方面的材料结合在一起研究,因为在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总之,我国西北地区从齐家文化开始已经迈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谱写了文明史的第一页。

### 注 释

- ①《青海柳湾》,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八号,文物出版社。
- ②《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 ③同②图版貳:6。
- ④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78页,69页。
- ⑤《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图版叁:1。
- ⑥《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 ⑧李仰松:《佉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示》,《考古》1961年7期。
- ⑨志远:《海南岛黎族人民的葬俗》,《考古通讯》1958年7期。
- ⑩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考古》1964年4期。
- ⑪《外国奇风异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
-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70页。
- ⑬许顺湛:《“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考古》1962年5期。
- ⑭《人民日报》1988年1月17日第一版。